
晚清新式教育与辛亥革命

——以杭州及浙江为重点的考察

戴鞍钢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433)

【摘要】晚清新式教育在杭州及浙江起步较早, 发展较显著。它打开了众多年轻学子的眼界, 启迪了他们的心扉, 促使其更多地关注社会和时局, 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在此基础上, 清末历史的走向, 推动他们逐渐赞成民主共和, 并积极投身辛亥革命。

【关键词】晚清; 新式教育; 辛亥革命; 浙江; 杭州

【中图分类号】K257; 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1)05—0027—05

教育对人们思想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乃至杭州及浙江辛亥革命的酝酿发动, 同样得益于新式教育的开展。综览海关报告、乡土文献、时人记载和追忆等各类资料, 或可得见其内容的生动, 以及新知识阶层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和贡献等。^①

一

新式教育即近代文化知识在中国的传授, 起步于鸦片战争前后的东南沿海。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 为了推进其传教事业, 设立了一些教会学校, 较早的有 1839 年美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 首批学生有 6 名, 全是男生, 其中有后来赴美留学的容闳, 年龄最大的 15 岁。他们全都住宿, 免收学杂费和食宿费, 半天学中文, 半天学英文。1842 年, 该校由澳门迁到香港, 学生增至 20 多人。课程设置也有增加, 除中英文外, 还有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音乐等。同时也向学生宣讲基督教的知识。^{[1] (PP. 19—20) [2] (PP. 42—48)}

五口通商后, 教会学校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相继设立。1843 年英国教会在宁波开设的女子学塾, 是传教士在华设立的第一所女子学校。^{[3] (P. 239)}据统计, 1860 年前, 天主教在香港、澳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设立了 38 所学校, 其中上海有 15 所, 福州、香港各 6 所, 广州 4 所, 宁波 3 所, 厦门、澳门各 2 所。基督教新教在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开设的各式学校有 50 所, 学生有 1000 余人。^{[4] (PP. 288—289)}其中有些人成为“通事”即早期的买办, 1863 年李鸿章曾描述: “查上海通事一途, 获利最厚, 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 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 佻达游闲, 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 辄以通事为通逃薮; 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学, 招本地贫苦童稚, 与以衣食而教之。”^{[5] (P. 182)}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教会学校由最初的五口通商城市扩展到内地。到 1875 年, 各地的教会学校总计有 800 所, 约 93% 为小

收稿日期:2011—09—01

作者简介:戴鞍钢(1955—), 男, 上海青浦人, 历史学博士,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校学位委员会委员, 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主要从事晚清史、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学程度。其中如 1871 年设于武昌的文氏学堂(华中大学的前身)、设于苏州的存养书院(东吴大学的前身)，都是较有影响者。^[6]
^(P. 112)据估计，1911 年上海教会学校的在校学生当不少于 2 万人。^[7]

表 1 清末杭州的官办学校(1902 – 1911) [11] (PP. 8 – 9)			
开办年份	校名	校址	备注
1902	钱塘高等小学堂		前身为崇文书院
1902	仁和高等小学堂		前身为紫阳书院
1903	浙江高等学堂		
1906	浙江法政学堂	清泰门马坡巷 原军械局旧址	
1907	浙江女子师范学堂	银洞桥	
1908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浙江贡院	1913 年改为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
1910	浙江省中等农业学校	横河桥土桥头	
1911	浙江省中等工业学校	蒲场巷报国寺	
1911	浙江省中等商业学校	黄醋巷	
此外,杭州全城还有初等小学堂 40 所。			

另一方面，自 19 世纪 60 年代洋务运动开展后，一批洋务学堂陆续开办。1897 年在杭州，“浙江巡抚廖谷似寿丰以发封之普慈寺址，创设求是中西书院(以讲求实学为旨故定名求是)，委派杭州府知府林迪臣启兼任总办，陆冕侔师懋勋为监院，下设事务二人，一掌文牒为陈仲恕，一司会计为俞吉斋，并聘美教士王令赓课格致、化学、英文，卢子纯葆楨课算学，陆叔英康华课英文。招收二十岁以上之举贡生监三十名，由杭州府考试察看录取，月给膏伙，优者随时给予奖金”。时年 25 岁的杭州人项兰生前往应试，是年 5 月“录取榜首后即到校上课。同榜十人，有汪叔明、张峰材、钟璞岑等”。^②

戊戌维新后，又有一些传授西学的新式学堂设立。新近出版的《蔡元培日记》载，1899 年 1 月 27 日，他在绍兴走访在当地办新学的翁氏，“其人甚朴挚，而留意新学，于其家设一义塾，学者于读书外，兼读尺牍及市井数学，以皆商人子弟也。及来此，于学署中辟一馆，学生于读书外，兼课运砖、蒔花，以皆农工家子弟也”。^{[8] (P. 100)}在日记中，蔡元培还记述了他担任监督的绍兴中西学堂的办学情景：1899 年 2 月，学堂聘用的“法文教习到”；3 月，“学堂开学，学生到者二十三人，附课生三人，算学师范生一人”，“学堂课英、法文、算学”；当月某日，他“到学堂，阅正月《中西日报》，凡可观者，皆识别之，以便学生检阅”。^[8]

^(PP. 104–105)1900 年 10 月，蔡元培离开绍兴中西学堂，前往杭州筹办师范学校，虽几经奔波，终无结果。1901 年上半年，蔡元培时

常旅居上海，广泛收集各类新式学堂的学制和课程设置等资料，潜心研究，撰成《学堂教科论》，由杜亚泉开办的普通学书室印行。^{[9] (P. 19)}

1901 年清末新政启动后，新式教育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展，正如 1901 年 9 月 21 日孙宝暄《忘山庐日记》所记：“朝廷降诏，各省大书院改为大学堂，府书院为中学堂，县书院为小学堂，内地风气从此大辟矣。”^{[10] (P. 396)}其间，杭州及浙江的新式教育也有明显推进。

杭州的新式教育，如前所述始于 1897 年。1898 年，林启在西湖金沙港开办蚕学馆，招生传授科学的植桑、养蚕、缫丝的知识 and 技艺，学制二年。这是已知的浙江第一所职业学校，受到各方注目。次年，林启又在大方伯的园通寺开办了养正书塾，设有语文、小学、经学、修身、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后又增设格致、体操、音乐、英文等课目。这是已知浙江最早的一所普通中等学校，清末新政期间于 1901 年改名为杭州府中学堂，1910 年更名为浙江第一中学堂。^{[11] (PP. 7-8)}

表 2 清末杭州非官办学校(1902 – 1910) [11] (P. 9)

开办年份	校名	校址	备注
1902	安定中学堂	葵巷原敷文讲庐旧址	
1904	惠兴女学堂	金钩弄	
1905	宗文中学堂	皮市巷	前身为宗文义塾
1905	初等师范学堂	大东门直街	
1905	工艺女学堂	林司后	
1906	铁路专门学校		
1906	浙江高等工业学堂		
1906	富华工艺学堂	三角荡	
1907	蚕桑女学堂	上板儿巷	
1910	私立浙江法政学堂	西大街	

此外，还有私立的两等、初等小学堂 16 所。

v

清末新政启动后，杭州的新式教育发展很快，其概况可见表 1、表 2。当时在杭州的教会学校，有育英书院、惠兰中学、广济医学院等。^{[11] (P. 9)}这一时期，杭州各团体、行业公所及私人也办了不少新式学堂。

二

清末新政期间，浙江“最低级的学校是初等小学堂，每个市镇上都有这种学校，只教中文和简单的算术。进这种学校，必须通过一次简单的考试并保证做个好学生，完成所有的课程。本地还建有高等小学堂，课程相似但要求较高”。^{[12] (P. 254)} 夏衍曾回忆他进新式学堂的经过：“我八岁那一年(1908年——引者)正月，母亲带我去樊家去拜年，当大姑母知道我在郭家店的私塾读书，就严肃地对我母亲说，这不行，沈家是书香门第，霞轩(我大哥)从小当了学徒，可惜了；又指着我说，这孩子很聪明，别耽误了他，让他到城里进学堂，学费、膳费都归我管，可以‘住堂’(住在学校里)，礼拜日可以回家。大姑母主动提出，母亲当然很高兴地同意了。这一年春季，我进了‘正蒙小学’，这是一家当时的所谓‘新式学堂’，但是功课并不新。我插班进二年级，一年级学生念的依旧是《三字经》，不过这种新的《三字经》已经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今天下，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南北美，与非洲……’了”。^{[13] (P. 8)}

继高等小学堂后，“接下来就是进入府中学堂，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古典文学、数学、地理、中外历史、基础科学，此外还有英语和日语。从府中学堂毕业后就可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它设在杭州城，有三名外籍教师任教，课程同府中学堂一样，不过要求更高，而且还附加法语和德语”。^{[12] (P. 254)} 当时有人在日记中写道：“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昌言废之而已。”^{[14] (P. 250)}

浙江高等学堂等各级新式学校的设立，为年轻的学子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也为他们提供了较之前人更多的人生和职业选择。民国年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追忆他在20世纪初入学浙江高等学堂，“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较真切了”。他开始读包括英文原版的世界史在内的各类书籍，“所接触的知识非常广泛，从课本里，从课外阅读，以及师友的谈话中，我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知识日渐增长”。^{[15] (P. 66)} 时值革命思潮日渐高涨，“浙江高等学堂本身就到处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杂志和书籍，有的描写清兵入关时暴行，有的描写清廷的腐败，有的则描写清廷对满人和汉人的不平等待遇。学生们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刊，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足以阻止他们”。^{[15] (P. 69)}

去江南其他城市求学的浙江学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演变历程。周作人在1901年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他后来回忆说：“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也有些好处，第一是学了一种外国语，第二是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也开始做起旧诗来。这些可以笼统的说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杂乱的拼在一起。”^{[16] (PP. 113-114)}

各种新知识的接受，促使这些学生更多地去观察社会、时局和思考。当时杭州“大部分湖滨地区均被八旗兵军营所占，旗营一直延伸到了城内半英里之处”。^{[17] (P. 19)} 这些所谓的旗兵，“实际上绝对不是兵，他们和老百姓毫无区别。他们在所谓‘兵营’里娶妻养子，对冲锋陷阵的武事毫无所知。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有政府的俸饷而无所事事，他们过的是一种寄生生活，因之身体、智力和道德都日渐衰退。他们经常出入西湖湖滨的茶馆，有的则按当时的习尚提着鸟笼到处游荡，一般老百姓都敬而远之。如果有人得罪他们，就随时有挨揍的危险。这些堕落、腐化、骄傲的活榜样，在青年学生群中普遍引起憎恨和鄙夷”。^{[15] (P. 69)}

即便如此，在科举制度明令废止前，家长和学生们仍对科举中仕抱有期望。陈布雷忆述，1903年14岁的他奉“父命应童子试，心不愿而不敢违”。初试失利，又去应府试，名列第一，“父始色霁”。^{[18] (P. 21)} 蒋梦麟自述：“为求万全，我仍旧准备参加科举考试。除了革命，科举似乎仍旧是参加政府工作的不二途径。”他也如愿考上了秀才。有趣的是，“郡试以后，又再度回到浙江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而且“回到学校以后，马上就埋头读书，整天为代数、物理、动物学和历史等功课而忙碌。课余之暇，又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并与同学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郡试的那段日子和浙江高等学堂的生活恍若隔世”。而他的父亲和亲友们则为他考上了秀才而兴奋不已，都希望他就此有远大的前程，“能一步一步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光大门楣，荣及乡里，甚至使祖先在天之灵也感到欣慰”。^{[15] (P. 75)}

但蒋梦麟自己则另有打算，他不再满足于已接受的新知新学，“渴望找个更理想、更西化的学校”，进一步充实自己。1904年，他“趁小火轮沿运河到了上海，参加上海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幸被录取”。1908年，他又回到杭州“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结果被录取”。^{[15] (PP. 76, 84)} 从此，他步入新的人生历程。

杭州的一些专门学校，如商业学堂、农业学堂、艺徒学堂、巡警学堂和法政学堂，都是由官府全部或部分出资建立的。凡官立学堂，“浙江本地学生不收学费，外省籍学生象征性地收取一点。食宿、服装、课本等费用，由学生交纳”。在杭州，也有一些女子私立学堂，其中著名的是女子工艺学堂。“兴办女子教育的结果，是现在女子中能读书写字的人已占很大比例。而几年以前，极少有女子识字。事实上，那时女子识字简直就是奇事”。^{[19] (P. 45)}

在当时的宁波，开办了各级各类学堂，“各地的人都非常渴望送自己的孩子去学习西学。成百上千的年轻人学习英语，在年轻一代人中，英语迅速取代了迄今为止传统中国文人心目中至关重要的中国经典的地位。过去浙江很容易见到的好书法，现在要付费才可以求到。所有阶层的人似乎一直认为学习毛笔书法是浪费宝贵的时间，而毛笔书法不久以前还是读书士子的必修课。英语战胜了《四书》，数学战胜了书法。现在，在浙江找一位优秀的传统中国学者，就像十年前找一位操英语工作的本地人一样难。即使在本省内地一些相对小规模学堂，英语教师也拿很高的薪水，供不应求”。^{[19] (P. 46)}

1903年10月20日，孙诒让在温州教会艺文学校发表演说：“吾们温州虽是通商码头，而地方风气亦未能开通。敝县瑞安近年来初办几处学堂，而经费短绌，校舍、课程都未完备。学董、讲师、办事人员多是科举出身的旧人，恐怕对于新的教学方法及新的各科教材，所见所知都有限。总而言之，诸凡草创，比较各强国的先进规模，真不啻天壤之判了。”^{[20] (P. 468)}

时隔五年，温州师范学堂开办，“有200名学生和12名教师，大多数教师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1911年，又有1所中学堂设立，有307名学生和23名教师，“课程包括中文、古典文学、伦理学、历史、英语、地理、生物、自然、数学、化学、物理和体育，大多数教师用从日本翻译过来的课本吸收新知识”；当地还有2所专门学校，“一个养蚕，一个培养用本国棉纱织布的人员”；初级学堂则有209所，有7912名学生和715名教师。^{[12] (PP. 171—172)}温州和周围地区的居民，甚至“正在酝酿建立幼儿教育体制”。^{[19] (P. 49)}

在清末杭州及浙江各地相继设立的这些新式学堂中，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得以传播，并允许学生阅读中外报刊，民主思想渐入学生的心头，反观当时中国专制统治的黑暗现状，很多学生逐渐倾向了接受革命的主张。陈布雷回忆，1902年他13岁时，在浙江慈溪董宅私塾读书。“其时大哥提倡新学，以自然科学之研究相倡导，又同情于颠覆满清之革命思想”，陈布雷深受其影响。主持私塾的当地名士董子咸、董子宜兄弟亦提倡新学，“是时子咸、子宜、去矜、红伯诸先生及大哥等经营出版事业于沪上，输入新书及报纸杂志甚多，董氏斋中堆积盈架，暇辄往取读，尤喜阅《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杂志，有时于夜课向子咸先生借读，翌日午前尽一卷而归之”，思想渐趋激进。曾与同学“组覆满同志社，辟一密室，请画师绘一墨笔黄帝像悬室中，相率礼拜之，且习为革命之演说”。^{[18] (PP. 18, 20)}

1904年始，陈布雷先后入学慈溪县中学堂、宁波府中学堂、浙江高等学堂，见识愈广，愈倾向于反清革命主张。他在浙江高等学堂就读时，“以性情气谊相投合者，则为绍兴之沈柏严、吴县之邹亚云、兰溪之胡心猷诸君。常以民族革命之义相勉，而陈君君哲尤激昂，时时以鼓吹种族革命之刊物假阅焉”。该校国文课教员沈士远，“乐与学生接近，同学时时往其室谈话，沈先生常以《复报》《民报》及海外出版之《新世纪报》等，密示同学，故诸同学于国文课艺中，往往倡言光复汉物，驱逐胡虏，毫无顾忌，唯有时以□□字样代之而已”。1911年夏，他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即去上海任《天铎报》撰述，结识宋教仁、于右任等革命志士，“过从甚密”。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布雷“意气凌厉，曾撰《谭鄂》十篇，鼓吹革命”，自此声名大震。^{[18] (PP. 32, 33, 48)}

蒋梦麟追忆：“我们从梁启超获得精神食粮，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志士，则使我们的革命情绪不断增涨。到了重要关头，引发革命行动的就是这种情绪”。他指出：“这就是浙江高等学堂的一般气氛，其他学校的情形也大都如此。”^{[15] (P. 69)}即使在官办的军事学堂里，革命思想也在暗中传播，如同盟会会员兼光复会会员的蒋尊簋主持的弁目学堂，他在教学中以革命思想影响学生，有不少教职员和学生参加了光复会^⑨。求是书院的学生王嘉忱曾参加1906年同盟会成员策动的萍浏醴反清起义，陆军小学的师生参加了辛亥革命光复杭州的战斗。^{[11] (PP. 10—11)}凡此种种，均生动地显现了晚清新式教育与杭州及浙江辛亥革命的内在关联。

注释：

①杭州及浙江各地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具体史实，以及前人的相关成果，可参阅金普森等主编的多卷本《浙江通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傅璇琮主编的多卷本《宁波通史》（宁波出版社 2009 年版）和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多卷本《杭州文史丛编》（杭州出版社 2002 年版）等。本文旨在重点揭示晚清新式教育与杭州及浙江辛亥革命的内在关联。

②宣刚整理《项兰生自订年谱（一）》，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九辑，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191 页。据整理者按：项兰生是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银行家，名藻馨，字兰生。1873 年生于浙江杭州，1957 年在上海去世。他曾在杭州参与创办白话报、安定学堂（现为杭州第七中学）、浙江兴业银行等，并先后在浙江高等学堂（现为浙江大学）、大清银行、中国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汉冶萍公司等担任要职。

③1900 年至 1909 年，为编练新军，培养掌握西式军事知识的军官，在杭州官办的军事学校，先后有浙江武备学堂、浙江弁目学堂、浙江炮工学堂、浙江陆军小学、浙江讲武堂等。详可参阅洪昌文《辛亥革命前夕杭州的近代教育》，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杭州文史丛编·教育医卫社会卷》，第 9 页。

参考文献：

- [1] 王忠欣. 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2] 容闳. 西学东渐记 [M]. 长沙:岳麓书社, 1985.
- [3]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 [4]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5] 李鸿章. 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 [G] //黄仁贤, 高时良. 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 [6] 吴宣德. 中国区域教育发展概论 [M]. 长沙: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7] 熊月之. 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 [J]. 近代史研究, 1997, (4).
- [8] 王世儒. 蔡元培日记:上册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9] 张晓唯. 蔡元培传 [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 [10] 孙宝暄. 忘山庐日记:上册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1] 洪昌文. 辛亥革命前夕杭州的近代教育 [G]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杭州文史丛编·教育医卫社会卷.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2.
- [12] 陈梅龙, 等. 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 [G].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3.
- [13] 夏衍. 懒寻旧梦录 [M]. 北京:三联书店, 2006.

-
- [14] 恽毓鼎. 恽毓鼎澄斋日记 [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4.
- [15] 蒋梦麟.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 [M]. 上海:东方出版社, 2006.
- [16]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上册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 [17] 威廉·埃德加·盖洛. 中国十八省府 [M]. 沈弘, 等译校.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8.
- [18] 陈布雷. 陈布雷回忆录 [M]. 上海:东方出版社, 2009.
- [19] 郭大松. 中国海关《十年报告》选译(1902—1911) [G] //李学通. 近代史资料:总 117 号.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20] 孙延钊.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